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4014

作者观·文本观·读者观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理论新探

王啟泽[1]，徐向阳[2]

（1. 空军工程大学 军政基础系，陕西 西安 710051；2.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理论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诉求。“作者之死”理论认为，具有主体性的作者只有在其文本受到读者接受之后，才能最终确立其主体身份。“作者之死”理论呈现的作者关怀，与中国先秦道家、儒家文论的主体精神追求具有同构性，并得到了中国当代文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与批判性阐发。其所谓“作者之死”，实则是对“文本之生”的呼唤，因为“文本”能够连接消逝的作者与无限的读者，实现主体间的跨时空交流。“作者之死”理论的“文本”概念，不仅折射出罗兰·巴特理论转型中的文学观与真理观，也凸显了一种生产性的读者观。他认为，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是作者主体性与文本开放性的落脚点，亦是文学生命力的不竭源泉。互为依托的作者观、文本观与读者观，既是巴特“作者之死”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也是探究该理论及其阐释价值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罗兰·巴特；“作者之死”；作者观；文本观；读者观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4-0127-08

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一系列辨识度极高的文论主张中，“作者已死”或许是其最具破坏力与号召力，同时也最为学界熟知的一个观点。汪民安认为：“或许，罗兰·巴特将不是作为一个理论家，而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朽。”[1] 在喊出“作者之死”前，巴特已发表诸多文学作品、评论文章，出版了不少理论著作。尽管其文学家身份未被重点关注，但其作者身份从未受到质疑。“作者之死”观点中的“作者”，不指向现实生活中身为作者的具体的社会人，亦不指向作者群体或其存在价值，而是出于探讨作者身份与“文本”（区别于由作者署名的“作品”）之间互动关系的目的，为厘清现有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存在已久的作者观的形成过程，所选取的一个理论出发点。张永清在其近作中强调：“从读者概念的意涵及所指、语境原则等方面看，‘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是巴特要推翻而不是要‘昭告’的理论神话。”[2] 其研究表明，巴特的作者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层次。任何时代，作者观的形成都与文本观、读者观密切相关。三者在文学理论范畴中互为依托，它们既是巴特“作者之死”理论建构的内在结构，也是研究该理论及其阐释价值的重要维度。

收稿日期：2026-02-0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美学视域下陕西文学批评研究”（2019J031）；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小说修辞的认同机制研究”(21ZD023)

作者简介：王啟泽，男，陕西略阳人，空军工程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一、作者观：“作者之死”的文论对话价值

对于“作者之死”的提法，孙绍振认为：“巴特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其目的是为了彻底将文本意义本质化（固定化）的根源扫除。”[3]135 巴特注意到，文本的解释权、赋义权长期被默认为一种专属于作者的权威，且这种观念已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桎梏。因此，他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与作者观照和读者立场相关的“文本”上，用“作者之死”的零度理论立场引导读者参与“文本”的意义生成。对读者介入性的强调，体现了巴特更新作者观的要求。“作者之死”理论的作者观不仅为作者提供了不同的写作视角、丰富的文学样态，也为追求读者和作者的直接对话，消除二者之间横亘已久的鸿沟，产生由读者发展而来的新的作者提供了契机。

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巴特不满“作者一经被发现，文本一经被‘解释’，批评家就成功了”[4]63 的批评现状，反对让创作意图分析成为文学批评的全部内容。在他看来，作者身份不是一种先于作品的存在，作者本人只有首先作为个人在客观世界中生存，才能在发现和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所要写作的文本；读者只有将自己与作者一视同仁，作为平等的生存个体观照文本，成为读者意义上的作者，才可能进入文本；文本也必须得到原作者和作为读者的作者这两者的共同观照，才能最终获得文学身份。正是出于对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洞悉，巴特才高呼“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4]64，以指明作者应该在文本生成的立场上付出身份认同“代价”。

对于作者身份的思考，在中西文论体系中均有基础性的理论价值。在对作者身份、创作与接受活动、作者和读者以文本为媒介的互动过程等问题的思考中，巴特“作者之死”理论的内核与庄子“心斋”“坐忘”的文论思想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心斋”“坐忘”是对文学创作者、接受者提出的精神要求。其认为，无论是创作还是接受活动，主体都应该在一种忘我的生存状态中介入文本。在这种“忘生近死”的主体关系中，作者和读者能够在自身有限的生命过程中，体悟文本这类无生命存在物的无限绵延的可能，由此激发生存主体投入文本创作和接受实践的愉悦和热情，作者、读者同文本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因此得到理论提升。关于“心斋”，《庄子·人间世》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5]130-131 对此，陈鼓应解释道：“你心志专一，不用耳去听而用心去体会；不用心去体会而用气去感应。耳的作用止于聆听外物，心的作用止于感应现象。气乃是空明而能容纳外物的。只要你到达空明的心境，道理自然与你相合。‘虚’（空明的心境），就是‘心斋’。”[6]143-144 可以说，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听之以气，是庄子对个体认识世界程度的三种看法，也是他在自己走近“作者之死”状态、追求艺术化人生体验的过程中获得的真实体验。

如果说“心斋”要求作者、读者在文学创作与接受活动中追求一种“绝圣弃智”的状态，“坐忘”则同样对作者和读者提出了“离析形体”“除其心识”的要求。“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5]261 陈鼓应进一步解释道：“不着意自己的肢体，不摆弄自己的聪明，超脱形体的拘执、免于智巧的束缚，和大道融通为一，这就是坐忘。”[6]242 言之有物是作者进行创作的前提，然而创作过程中作者却不能执着于自己希望表达的情感体验，而应该以忘却自身肉体存在的思维活动形式自由地组织各种文本内容。这种忘我的状态，既是“作者之死”观念的作者立场观照，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作为作者的巴特在其创作中体验到的“心斋”与“坐忘”的精神状态。

通过对作者创作主体中心地位的消解，巴特希望强调的不只是读者的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读者在文本的意义获得方面应有的“作者”身份。文本的意义在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论下不再依附其他权威的注解。在他看来，所有参与文本实践的活动主体在文本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文本的能指得到漂移，面向发展中的社会现实。由此，文学文本不再具有“作者产品”的属性，批评的任务也不再局限于对作

品进行“解释”，文本不再是由作者署名的一堆待解的文字，而成为联系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和媒介。无论是庄子的“心斋”“坐忘”，还是巴特的“作者之死”，最终都成为一种对作者创作状态的要求、对读者解读状态的倡导。

巴特对中国古典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自己的课堂上多次讲授老子、庄子、孔子等思想家的文论思想，以至于被韦遨宇称为“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影响且自觉地加以认同的当代文论大师”[7]。“作者之死”理论的文论对话价值不仅表现在其同庄子代表的道家文论的共鸣上，还体现在它与儒家文论中孟子的有关文论立场的契合上。孟子“知言”“养气”的观点不仅是其社会思想、人生态度的表现，也是他在更深的文学自觉程度基础上，对作者体验表达的辩证理解、对主体创作实践中生存状态的理性关注。何谓“知言”？《孟子·公孙丑上》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8]65 周玄毅认为，“知言”并非知“言”，“而是以既有之内在标准知‘言之所失’，归根到底是因为知‘心’”[9]。这里提及的内在标准，看似与“心”“气”等主观性强、不易阐明的概念有关，实则强调的是接受者要以入世的态度和符合特定历史时期发展需要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看到的言论。巴特的“作者之死”立场是“入世”的，他呼吁的不同于“作品”的“文本”，与孟子“言无实不祥”“充实之谓美”的文学立场、美学追求也是内在统一的，体现了中西文论参与社会实践、积极介入现实，并在不断演变的客观世界中达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理论追求。

论及“养气”，孟子将其中的“气”称为“浩然之气”，并提出如下判断：“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8]65 其中，“配义与道”是“养气”的方法，反映了“气”与个人品质的直接关联；“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是所养之气的特征，即“气”不是在偶然的正义行为中能够获取的，而是在长期的道义积累并将其内化于心的过程中养成的。除了对“养气”概念本身的阐释，从文本接受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应把“养气”的追求与“知言”的途径结合起来，看到“养气”不只是对作者文学创作活动的要求，也是读者进行有主体意识的文本接受的需要，其与“作者之死”对作者和读者两种立场的关注具有一致的理论内核和实践追求。

“作者之死”不是对作者主体的排遣，“心斋”“坐忘”不是对作者创造性实践的否定，“知言”“养气”也不是对文本的随意解读和对作者创作倾向的强加限制，它们包含的作者视野是发展的、面向现实的，它们共同的主体关注和理论呼吁为中西文论的动态契合提供了实证。

二、文本观：“作者之死”的理论转型意义

提出“作者之死”时，巴特不仅具备了前沿的作者观，也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本观。虽然巴特此时的文本观距离其在《从作品到文本》和《文本理论》中极力呼吁的“文本”概念还有一定距离，但作为其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转型期的典型理论立场，“作者之死”理论中的文本观体现了丰富的兼容性与开放性，在巴特的文本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承续作用。

在《结构主义活动》一文中，巴特表达了对结构主义可能为文学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的期待：“首先，它（结构主义）反映了对象的一种新的范畴，这种范畴既不是真实性，也不是理性，而是功能性……其次，它尤其充分地揭示了人类借以赋予事物以意义的人类自身的过程。”[10]260 作为一种具有系统性的认知模式，结构主义对于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因为以结构的方式来表现世界，结构主义活动成为一种具有“非真实”“非理性”特征的活动。这种介于真实和理性之间的认知方式符合巴特期待的“文本”应有的特征，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身所处的价值体系和意义体系，揭示已有的赋意过程，让人们发现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巴特相信，“结构主义的对象，并不是富于某些意义的人，而是制造意义的人……意义之人，便是从事结构研究的那种新的人”[10]260。作为拥有独立认识和意志的生存个体，人们能够以自己的认知和需求

来定义各种外界存在的意义，然而人本身并不“富于意义”，我们能做的是从人类历史中认识已有“意义”、在社会发展中发现并理解新的“意义”。作者创作出的文本和读者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区别，但作为主体的作者、读者在其写作、阅读活动中发现了不同的“意义”，分别成为有别于以往的自己的“意义之人”。由此观之，巴特期待的“文本”实际上已经存在，其存在于作者和读者以文本为媒介的沟通之中，也存在于有关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每一次新的认识和讨论以及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之中。

文学与社会实际的密切关系，是文论研究领域无法忽视的现实基础。在提出“作者之死”观念的同时，巴特直言不讳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作者中心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和顶点”[11]。正因如此，他将自己的研究转向了对“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来自“属于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4]62 的“文本”本身的关注，希望人们的文本观能回到对文本和文本相关主体的客观理解上来。此时，他以后结构主义研究者的身份审视和发展了结构的作用：“结构可以在其每一次重复和每一个阶段上被后续、被‘编织’，然而，却没有底，书写的空间需要走遍，而不可穿透。”[4]63 巴特认为，追求走遍文本、拆解文本的解构活动并没有穿透文本，因为文本的组成肌理（编织方式）已经由作者完成，文本已脱离承载它的文字符号及其文化源点，处于一种由自身建构的动态稳定状态中。此时，解构活动虽能对文本细节进行逐一拆解，但由于它对文本的解构必须处于文本的意义范畴之内，因而其并不能破坏文本的动态平衡。面对原文本的写作活动和关于它的解构活动，接受者需要投入自己具有创造性的“书写”活动才能获得主体性。这一认识，不仅成为巴特联结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内在逻辑，也成为他提醒人们捍卫自己作为读者的“书写”权、对抗作者中心主义的有力方式。

巴特通过强调“文本”应有的解读自由、解构自由等方式，表达了对“文本影响力”的关注。这种呼吁并非空穴来风，早在西方文论领域具有源头性意义的思想家柏拉图那里，诗人就被驱逐出了他的“理想国”，因为诗人创造的诗文“会败坏它的读者的心灵，除非他了解诗歌艺术的真谛”[12]。这里除了柏拉图对诗人“影子的影子”的身份总结、“远离真理”的主观评价，我们还看到他对文本之于读者的影响力的敬畏。如巴特所说：“生活从来就只是效仿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这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效仿。”[4]62 关注文本的巴特，从现实生活出发，强调“文本”不仅是作者的价值和情感所在，也应该是读者通过创造性活动产生的精神产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表达了相似的文本观：“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的感觉，使他从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艺术作品）是单独面对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13] 文学在同它的接触者本人的直接沟通方面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具有的优势，因为文学文本能够直接关切作者和读者的性格、记忆、情感、价值观等内在本质，让他们以文本为媒介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此时文学的材料——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语言作为反映人的思维的存在物，是一种最能接近人的内在本质的艺术材料。相关研究指出：“巴尔特也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出发来看待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因为当一个文本摆放到读者面前，由文本的字面意义造成的联合，无论读者做什么，无论怎样理解和阐释，它都不会是杂乱无章的，因为文本总是由某些符码、语言、某些定性的清单预先取用和写入。”[14] 可以说，这种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的、由文本观的变革引发的思想革命，不仅是巴特进行理论选择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文论自身演变的必然历程。

值得说明的是，巴特文本观对结构主义的出走，并不能说明后结构主义的进步性或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学领域的失效。结构主义的科学性追求与文学的情感倾向之间的矛盾，是任何文论建设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其中开放的认识论与接受观依然能够为今天和未来的文学与文论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理论与它所处的环境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巴特“作者之死”理论是在充分了解西方文化、把握西方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那么我们的理论建构也需要“以对中国实践的解读阐释为中心，构建原创性概念、命题与文论思想”[15]。从“作者之死”的宏大理论建构立场来说，文学和它所处的人类社会将如何发展，是今天的我们难以预料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今人对文学的所有研究与讨论，都是对于未来社

会的一种想象。想象是广阔的，而未来的走向只能遵循其中一种，所以今天的想象中有很多都会在未来被证明是谬误，但在更远的未来，谬误也可能转变为真理。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真理观，巴特才敢于在自我否定中大胆地进行理论转型，出入于多种理论体系；同时，因为文学文本所具有的开放性、未来性，巴特才始终坚持文学研究，“把文学写作、阅读活动与无意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互文实践”[16]，在对诸多研究对象充满兴趣的同时保持对文学研究的长期关注。

三、读者观：“作者之死”的接受主体观照

提出“作者之死”观念的《作者的死亡》一文，是通过对“书写”这一概念进行个性化定义来展开论述的。在文章开篇抛出其书写概念之前，巴特列举了他的著作《S/Z》的写作对象——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Sarrasine）中，一段对装扮成女人的被阉割的男人的细致描写，并对究竟是谁这样说（书写）做了五种设想。

是小说中的那位主人公即乐于以女人身相出现的被阉割的男人吗？

是因其个人经验而具有女人处世之道的巴尔扎克本人吗？

是宣扬女性“文学”观念的巴尔扎克吗？

是普遍都有的智慧吗？

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心理吗？[4]57

巴特认为，人们或将永远无从知晓最终答案，因为“书写是对于任何话音、任何起因的破坏。书写，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其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书写的身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其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4]57-58。孙绍振先生认为巴特以上论述的初衷是将读者从作者的固有权威中解放出来；同时认为“对于这个横空出世的说法，他（巴特）的论证却相当单薄”，“巴特提出的实质上是文本和传统的互文性问题，和艾略特提出的作家要舍弃个性融入传统差不多”[3]135。在此，我们不妨对其单薄的论证中的几种设想进行如下总结，以了解存在于巴特“书写观”中的“读者观”。

设想 1：文本主人公叙述；

设想 2：作者经验叙述；

设想 3：作者文学观叙述；

设想 4：普遍智慧（互文性）叙述；

设想 5：浪漫心理叙述。

无疑，这种认知方式保留了结构主义的观念，但此时巴特关注的重点已由宏观结构转移到文学阅读的接受角度，强调读者差异的多种可能性。从五种设想的排列来看，巴特对读者可能产生的接受角度的设想从本文内部出发，经由文本与作者的关系，到达社会的普遍认知与共通心理。这样的认知路径在今天的研究中应该说是惯常的、规范的，但在 1968 年的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中，却具有先锋性与引导性的干预现实效果。其对读者认识文本的意义层次、理解文本所处的现实社会，并在文本和现实中介入自己的主客观理解，具有鼓励和呼吁的作用。

“作者之死”的文本立场不是巴特凭空想象的结果，其理论基础来自解构主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指出：“有意识的和说话的主体取决于差异系统和延异活动；在延异之前，它不是当下在场的，特别不是对自身当下在场的。”[17] 语言和思想有密切的甚至同一的关系，但二者的对应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逻辑顺序。拥有能动的主观意志的表达主体（文本作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文本表达，然而无论是在呈现出的表达还是可能获得的接受中，均有差异和延异的存在。因此，当作者的主体身份在文本生成后离开具体文本，尤其是在接受者介入自己的意志并展开创造性的接受活动时，作者不在场的状况便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须。巴特以“作者之死”的文本观引入了解构主义哲学方法，我们在理解该观点

时也需要以更广的视野来考察文学和文学活动参与者的主客体关系。正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所说：“一切的哲学，以其依赖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说，都被宣告为是文学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内容来说，一切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又都是哲学的。”[18] 当我们在文论领域听到“作者之死”的声音时，不应使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家群体被趋离民族文学宝库建设者、创造者的位置，而应以更高的文学主体认识、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展现民族文学与文论的价值观，积极同他国文学与文论进行对话。这种对话能够让更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家、文论家认识到本民族文学、文论精神对于世界文学、文论发展的重要作用。于是我们也理解了孙绍振先生对巴特“论证单薄”之指摘的初衷：“对西方这种说法不假思索地鹦鹉学舌，不但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遮蔽，而且也是自我心灵的窒息。至于见到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宣布‘作者死亡，写作开始’就吓得哑口无言，就失语，就放弃了对话、质疑的勇气，实在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数典忘祖，也是对自己专业的妄自菲薄。”[3]135

近年来，“鹦鹉学舌”的状况在孙绍振先生、张江先生等文论家、文艺理论建设者们的呐喊和呼吁下，已大为改观，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文学和文论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表达。张江先生“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启示我国中西文论研究者重新审视中西文论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广泛、深入地探讨了西方文论的当代价值与理论局限。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的“强制阐释”，张江先生指出其核心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的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9]5。在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反序路径四个方面对“强制阐释”展开论证的过程中，张江先生分别在“场外理论来源大致方向”之二“构造于现实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之中，为实现运动服务的理论”，“反序路径的舛讹”之二“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之三“局部与全局的分裂”中，提及了巴特在“五月革命”的驱动下由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把符号学推向极端的动机，突出了巴特秉持的“符号就是符号本身，并不代表任何事物”“文学评论应当从语言的上下文来了解，不能涉及现实内容与思想内容”[19]15 观点，也观照了他“作者之死”的呼声。巴特对后结构主义的进入的确是仓促的，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政治生活中“结构不上街”口号的影响，使得摆脱结构主义者身份成了他当时的一种需要（虽然他本人从未以结构主义者身份自居）。巴特对符号学的憧憬和对结构主义的期待相似，也存在极端倾向。从文学发展与研究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观点，理论路径上的逆反之虞的确存在。与此同时，对于张江先生所引用的《现代西方哲学》第十八章第六节第一部分《巴尔特结构消融论与文本批判论》中提出的“巴尔特的观点就是反对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认为文学评论应当从语言的上下文来了解，不能涉及现实内容与思想内容”[20] 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跨学科译介以及文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现实差异等原因，导致了“不能涉及现实内容与思想内容”这一对巴特文本理论进行的值得商榷的定性见解的出现。巴特对文学意义的不断追求表明，能够以主客观立场认识“文本”，并从“文本”中解读和生成多种主体意义的读者，是其“作者之死”理论的由衷期待。巴特期待的读者的阅读活动接近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的“解释”活动——文本被视为解释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解释就是在人和世界之间进行永无止境的调解”[21]。

我们看到，无论是张江本人的论述，还是朱立元、周宪、王宁等同张江展开的相关讨论，主观预设及其“前置立场”“前置模式”“前置结论”才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强制阐释论》对巴特有关理论观点的分析主要表现在“反序路径”部分中，而该部分提出的警醒——“以局部、单向的理论为全局、系统的理论，只能收获畸形、偏执的苦果”[19]17，并不是张江先生对巴特本人或他的“作者之死”理论的接受主体观照的批评。相反，张江在“强制阐释”得到广泛讨论的次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的一篇直击“作者之死”理论相关问题的文章《作者能不能死》中，肯定了“作者之死”观念在现代版权意识的传播、主体精神客观化、书写者的身份认同、作者与文本同一性关系的深化、作者生命冲动和权力意志的回归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点明了形式主义和“上帝之死”对“作者之死”观念的影响，也认可并强调了作者“在文本生成及后来的阐释中‘在场’”[22] 的价值。这一方面说明“作者之死”是一个需要

借助哲学来探究的文论立场，另一方面也表明该理论蕴含着丰富的主体关怀，读者观、读者主体、阐释空间等维度，即是其中需要继续探究的内容。严驰认为：“他（巴特）的作者主体理论解放了文本空间，让读者走上了舞台中央，敲响了‘作者至上’时代的丧钟，作者主体性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后，也越发显现出其价值。”[23] 可见，在作者主体的分析性文学立场发展为读者主体的接受性文学立场这一过程中，作者主体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地位并非逐步降低，其在与读者群体之间更具合作性的交互中继续发展，共同走向符合时代要求的未来语境。

“作者之死”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巴特文本理论中重要一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强大的理论冲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巴特对作者主体的反向思考、对文本本质的理论探究、对读者身份的深度解析和热情呼吁，引起了世界各国众多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姚文放将巴特的学术研究总结为：“旨在认定批评写作是以某种方式打碎世界又重组世界，从而生产出新的意义；同时肯定批评实践将人们从阅读引向写作，使读者不再成为消费者，而是成为文本的生产者，从而凝练出以生产价值为本的文学批评模式。”[24] 这种源自读者的“生产价值”，不仅能在“作者之死”理论中见出身影，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巴特整个文学研究生涯的最高理论追求。从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文学四要素来说，“作者之死”理论似乎没有关注外部世界这一文学源头，带有一定的结构主义局限。然而，巴特之于结构主义的“入”与“出”行为本身，表征了一种接近“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观念。这种“旨在构建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与一定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的结构化关系，进而探寻文学作品意义生成的可能性”[25] 的理论立场，或许才是他追求生产价值的“作者之死”理论的内在逻辑，值得中西方学者在新的文学现实中展开更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 汪民安 . 序言 [M]// 乔纳森·卡勒 . 罗兰·巴特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5.
[2] 张永清 . 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罗兰·巴特《作者之死》再思考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5(4)：78.
[3] 孙绍振，孙彦君 . 文学文本解读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 罗兰·巴尔特 . 语言的轻声细语 [M]. 怀宇，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5] 刘文典 . 庄子补正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6] 陈鼓应 . 庄子今注今译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韦遨宇 . 中国古典文论与法国后结构主义 [J]. 国外文学，1991，11(2)：200.
[8] 杨伯峻 . 孟子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9] 周玄毅 . 儒耶人格修养观比较：以孟子的“养气”和保罗的“称义”为核心 [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66(4)：39.
[10] 罗兰·巴尔特 . 文艺批评文集 [M]. 怀宇，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 罗兰·巴尔特 . 作者之死 [M]// 赵毅衡，编选 . 林泰，译 .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507.
[12] Plato. Plato complete works[M]. Cooper J M, ed.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1200.
[13] 约瑟夫·布罗茨基 . 悲伤与理智 [M]. 刘文飞，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47.
[14] 肖伟胜 . 罗兰·巴尔特的“作者之死”与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衍生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45(5)：127.
[15] 赵炎秋 .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内部体系建构研究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29(2)：5.
[16] 邵亦杨 . 自由言说的力量：罗兰·巴特论艺术 [J]. 美术研究，2025(4)：120.
[17] 雅克·德里达 . 多重立场 [M]. 佘碧平，译 . 北京：生活·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04：33.
[18] 保罗·德曼 . 解构之图 [M]. 李自修，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2.
[19] 张江 . 强制阐释论 [J]. 文学评论，2014(6).
[20] 刘放桐 . 现代西方哲学 [M]. 修订本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38.
[21] 伽达默尔 . 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 [M]. 洪汉鼎，译 . 修订译本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26.
[22] 张江 . 作者能不能死 [J]. 哲学研究，2016(5)：3.

[23] 严驰 .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者”问题之思：以罗兰·巴特的作者观为视角 [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26(4)：36.
[24] 姚文放 . 20 世纪以来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与理论问题 [J]. 文艺争鸣，2022(9)：49.
[25] 姚文放 . 结构 / 建构：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意义生成 [J]. 江苏社会科学，2022(2)：203.

Author View, Text View, and Reader View：A New Exploration of Roland Barthes' Theory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WANG Qize[1]，XU Xiangyang[2]

（1. Department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Fundamentals,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 an 710051,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 China）

Abstract：Roland Barthes, a leading French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st, proposed his theory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gainst a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with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aspirations.The theory holds that the author as a subject can fully establish his or her subjectivity only after the text is received by readers. The authorial concern embedded in this theory shares a structural homology with the pursuit of subjective spirit found in pre-Qin Daoist and Confucian literary thought, and it has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undergone critical elaboration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of literary theory. What Barthes call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s in essence a call for "the birth of the text", for the "text" can connect a vanished author with an infinite readership and enable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e concept of "text" in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theory not only reflects Roland Barthes' evolving views on literary and truth in his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highlights a productive reader view. He believes that readers, as the receiving subjects, are the foothold of the author's subjectivity and the openness of the text, and also the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literary vitality. The mutually dependent views of the author, the text, and the reader constitute both the internal logic of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a crucial dimension for probing this theory and its hermeneutic value.

Keywords：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uthor view; text view; reader view

责任编辑：黄声波